

“荆轲刺秦王”新论

——中国古代的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

周桂钿

一 刺客荆轲

“荆轲刺秦王”是发生在战国时代的事情，司马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有详细记载。战国时代，按韩非子的说法，是“争于气力”的时代。

秦国本来是一个小国弱国，地处西边，没有实力与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抗衡，不参加诸侯会盟，被视为落后的夷狄。“秦僻在雍州，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，夷翟遇之。”秦孝公在周室衰微，诸侯力政的时候，有了危机感，想发愤图强，救亡图存，于是“布惠，振孤寡，招战士，明赏罚”。并下令国中：“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”过了两年，卫鞅劝秦孝公“变法修刑，内务耕稼，外劝战死之赏罚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。秦孝公采纳了卫鞅的霸道治国方略，实行三年，明显见效。这个卫鞅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人物商鞅。秦孝公开始实行商鞅变法，经过惠文君、武王、昭襄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，再到秦王政（即秦始皇），秦国实力逐渐壮大起来。秦国采取近攻远交的办法，各个击破。秦军攻韩，“得韩王安，尽纳其地，以其地为郡，命曰颍川”。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秦军又攻赵，围邯郸城，结果也是得赵王迁，尽取赵地。兵

屯中山,“引兵欲攻燕”(同上)。在秦兵已经吞并邻国,矛头直指燕国的时候,燕太子丹十分恐惧,就到处征集刺客,想通过刺杀秦王来解除本国的危机。于是,派荆轲出使秦国。荆轲为了取信于秦王,带了两件礼物:樊于期首与燕督亢之地图。樊于期是秦将,得罪秦王逃到燕国去。燕太子丹收留了他。秦王恨樊于期,同时也恨燕太子丹。秦王以重金(金千斤)高爵(邑万家)悬赏,欲购樊于期头。用樊将军头献给秦王,秦王一定很高兴,这样就可以接见来献者。另外,秦王有贪利之心,最高目标是“尽天下之地,臣海内之王”(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),要占领天下的土地,要高居于天下诸侯王之上,就是要统一天下,当上天子。当然,正如荀子所说:“夫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是人情之所同欲也。”(《荀子·荣辱》)又说:“凡人之性者,尧、舜之与桀、跖,其性一也;君子之与小人,其性一也。”(《荀子·性恶》)总之,“今人之性,生而有好利焉。”(同上)秦王只有贪利之性,不受礼义制约。秦王在节节胜利的时候,已经利令智昏,居然有人来献地图,一定很高兴。以满足秦王贪欲之性的方式,来取得秦王的信任,这样才可以接近秦王,才能在适当的时候实施突然袭击,进行恐怖活动。荆轲带着十三岁就杀过人的勇士秦舞阳,藏着沾染毒药的利匕首出发。荆轲上路时,太子和宾客都穿着白衣来送行,朋友高渐离击筑(打击乐器),荆轲唱道: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!”可见荆轲出发时已经作好了牺牲的准备。荆轲先收买秦王宠臣蒙嘉,蒙嘉向秦王传话说:燕王害怕秦王的威力,愿意投降,为了表示诚意,斩了樊于期的头和燕督亢地图,一起来献。这是假投降真刺杀的行为。果然,秦王中计,大喜,隆重接待荆轲。在看燕督亢地图时,“图穷而匕首见”,荆轲想抓住秦王,逼他签字。结果没有成功。荆轲被杀。荆轲的牺牲,换来的是“秦王不怡者良久”,很长时间不高兴。秦王精神受到很大震撼。后来的事实是,秦王大怒,派王翦、李信带兵攻打燕国。五年后,消灭了燕国,俘虏了燕王喜。再往后的事实是,秦统一中国,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,又在很短的时间中,强大的秦朝被陈胜、吴广等人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所推翻。

二 历史评价

对于以上事实,如何评价?我想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问题:一是对秦始皇的评价,一是对荆轲刺秦王的评价。

对秦始皇的评价,总体上说是暴君行暴政。首先是秦进攻他国诸侯。秦在商鞅变法后,国力日益强大。秦王政当权时,不断向外扩张,成为山东各诸侯最危险的敌人。各诸侯又恨又怕,也曾想联合对付,合纵不敌连横,逐渐为其蚕食。按墨子的《非攻》思想,“苟亏人愈多,其不仁兹甚矣,罪益厚。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,谓之不义。……杀百人,百重不义,必有百死罪矣。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,谓之不义”。(《墨子·非攻上》)进攻别的国家,抢夺财物,杀人如麻,是最大的不义。以这个标准来看,秦始皇进攻其他诸侯,就是行最大的不义。

其次,秦王在处理与诸侯的关系中,采取许多不正当不人道的行为,不讲道义,只凭实力,还经常使用欺诈的办法;商鞅开其头,张仪集大成。另如白起杀已降,坑赵卒数十万。秦王奉行的是“以便从事”,怎么有利就怎么做。正如李斯所说:“秦四世有胜,兵强海内,威行诸侯,非以仁义为之也,以便从事而已。”(《荀子·议兵》引)不讲仁义,不问方式,只要胜利成功就行。

第三,秦王朝短祚也是被指责的理由。秦始皇称皇帝以后十年就死了,二世和子婴在动乱中苟延残喘不到五年。秦朝这么强大又在这么短的时间中灭亡,给后人的深刻教训是什么呢?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说是:“然秦以区区之地,千乘之权,招八州而朝同列,百有余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,肴函为宫,一夫作难而七庙堕,身死人手,为天下笑者,何也?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这是根据短祚,来批评秦不施仁义。

第四,历代史家对秦始皇肯定的主要是统一中国,统一度量衡和统一文字。明代李贽称他为千古一帝。对于统一以后没有施行仁政,也是受批评的。

第五,在批评秦始皇的同时,历史上还表扬了一些反对秦王的人物如蔺相如、屈原和荆轲等。往往以秦王作为反面人物来衬托这些爱国的、大无畏的英雄人物。

对荆轲的评价,认为其人是勇敢的侠客。首先,荆轲刺秦王,虽然是个人行动,却是集体的创作,由太子丹主谋,田光参与策划,樊于期献身,还有秦舞阳配合,高渐离后续。大家都在为正义事业而献身。荆轲是主角。

其次,帮助弱者,对抗强者,荆轲敢于牺牲自己,勇敢、豪放、冷静,为后代敢死队树立了榜样。

第三,秦王威行诸侯,暴烈无比。荆轲是反霸勇士,抗暴烈士,敢于深入虎穴的英雄。

第四,儒家孔子讲“杀身成仁”,孟子讲“舍生取义”,荆轲成为“不成功则成仁”的典型。虽然没有成功,豪气贯长虹,英名垂千古。

第五,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是武侠小说的滥觞。荆轲也成为后代侠客的典范。所谓“士为知己者死”,所谓“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”,所谓“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”,都是侠客仗义的行为。

三 重新思考

荆轲刺秦王,事后两千多年,我们再来重新加以评论,还是有必要的。

首先,统一天下。天下大势“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”。周天子统治不下去时,天下就分了。春秋战国分了几百年,出现了合的趋势。战国时的七国,各诸侯都想统一天下,秦国的实力最强,最后实现了统一大业。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。统一是必然的,分久必合。由谁来统一,则有偶然性。偶然中有必然,由强者来统一,是必然的。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虽然也都想过并努力实施过统一计划,由于种种原因,都未能成功。秦国实行变法以后,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逐渐成为强者,就承担起统一的历史使命。秦始皇完成

统一大业,应该说是伟大的历史功绩。他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本格局。

其次,逆取。目标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,是正确的,手段就是为目标服务的。孟子说“春秋无义战”,韩非说,战国是“争于气力”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时代,德政道义不管用,没有实力办不成事,弱国无外交。兵不厌诈,秦王根据当时的形势,“以便从事”,取得节节胜利,最后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。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,秦王的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。秦王实行霸权主义,就是为了称霸世界,统一天下。用武力统一天下,就不可能不杀人(包括无辜的人)。孟子说:“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而得天下,皆不为也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朱熹认为这是说圣人心正。但是,孔子以后没有圣人,或者说没有得天下的圣人。因此,在历史上还是有杀一些无辜者而得天下的。曹操杀了吕伯奢,唐太宗杀了亲兄弟,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避免了一场血腥悲剧,而明太祖则经过几次惩治“谋逆罪”杀了一批开国元勋,如胡惟庸、蓝玉等。他们的犯罪都牵连一些所谓“党逆”,特别是蓝玉,牵连鹤庆侯张翼、晋定侯陈桓等一批大官,根据锦衣卫指挥蒋(王献)所告,“坐党论死者可二万人”。这二万人中,不可能没有一个是无辜的。就是大臣李善长仅仅提个少杀人的意见,也被赐死。实际上也是无辜的。倒是先死的刘基和徐达等人没有犯罪被诛,对于他们,先死成为幸事。孟子讲的是理想,与现实出入甚大。因为有这个理想,使后代不杀人和少杀人有了理论依据。在中国历史上,在争权夺利的殊死搏斗中,总是要杀一大批该死的和不该死的人。得天下,就是改朝换代,就是以武力夺取政权,没有不杀人的。这叫“逆取”。在争于气力的乱世,不进行逆取,则有失败的教训。宋襄公“蠢猪式”跟敌人讲道德,结果失败。韩非认为在争于气力的时代,仁义道德是无力的。他举例说:“徐偃王处汉东,地方五百里,行仁义,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,荆文王恐其害己也,举兵伐徐,遂灭之。”徐国只有五百里的地方,是一个小国,实行仁义以后,居然有三十六国愿意割地给它,荆国即楚国的国王感觉可能对本国不利,就派兵去攻

伐徐国,结果就把徐国消灭了。过去虽然有三十六国愿意割地奉献,这时却没有国家援助徐国抵抗入侵者,眼睁睁地看着强国把行德政的小国消灭了。可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许多小国的实力也抵抗不了楚国的进攻。齐国与鲁国相邻,齐国要攻打鲁国。“齐将攻鲁,鲁使子贡说之,齐人曰:‘子言非不辩也,吾所欲者土地也,非斯言所谓也。’遂举兵伐鲁,去门十里以为界。”鲁国派子贡去齐国进行外交活动。子贡是孔子学生中最善于外交活动的人。但是,齐国的人说,你虽然说得很有道理,我们要的是土地,跟你说的没有关系。结果,齐国派兵打到鲁国,在离国门只有十里的地方划为国界。可谓“兵临城下”。接着,韩非子作了这样的议论:“故偃王仁义而徐亡,子贡辩智而鲁削。以是言之,夫仁义辩智,非所以持国也。去偃王之仁,息子贡之智,循徐、鲁之力使敌万乘,则齐、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。”(《韩非子·五蠹》)徐偃王实行仁义,结果徐国灭亡了。子贡虽然有很高智慧又善于辩论,鲁国土地还是被侵占。由此可见,仁义道德、智慧辩论,不能维持国家的主权与土地。如果抛弃徐偃王的仁义,放弃子贡的智慧,加强徐国和鲁国的实力,使它们能够对抗万乘的强国,那么,齐国和楚国的贪婪欲望就不能在这两国中实现了。这里就说明道德与智慧在“争于气力”的战国时代,难以成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力。维护国家主权需要的是经济与军事的实力。

第三,顺守。陆贾的说法,商汤、周武王都是“逆取而以顺守之”。居马上得天下,不能也在马上治天下。陆贾对刘邦说:“秦任刑法不变,卒灭赵氏。向使秦已并天下,行仁义,法先圣,陛下安得而有之!”(《史记·陆贾传》)唐太宗君臣议论兴亡问题时,也谈到这个问题。“太宗从容谓侍臣曰:‘周武平纣之乱,以有天下,秦皇因周之衰,遂吞六国,其得天下不殊,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?’尚书右仆射萧(王)禹进曰:‘纣为无道,天下苦之,故八百诸侯,不期而会。周室微,六国无罪,秦氏专任智力,蚕食诸侯。平定虽同,人情则异。’太宗曰:‘不然。周既克殷,务弘仁义;秦既得志,专行诈力。非但取之有异,抑亦守之不同。祚之修短,意在兹乎!’”

(《贞观政要·辩兴亡》)唐太宗非常明确地指出,秦祚短的主要原因是得天下以后没有采取“顺守”的方针,不是“务弘仁义”,而是“专行诈力”。诈力可以用于对付政治敌人,不宜用于对付人民。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人民,与人民为敌,或早或迟,都要灭亡的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也表达这么个意思:在攻即统一天下的过程中,不施仁义,可以取得胜利;在守即统治天下时,不施仁义,必定很快灭亡。“攻守”形势是大不一样的。从历史上看,在战乱时代,强者胜。在统一的时代,如果不行仁义,那么再强也要亡国。这是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。

第四,秦王靠实力搞霸权主义,其他诸侯国的反抗是正常的。在乱世,实力强的诸侯搞霸权,企图征服其他诸侯。其他诸侯不甘心,起来反抗。“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”,于理不顺。反抗有两种不同的方式:一是发展本国实力,与霸权主义对抗;一是利用少数人的暗杀恐怖活动来打击霸权主义。燕国曾经有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。齐兵大破燕国。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,卑身厚币以招贤者。为身边的贤者郭隗“改筑宫而师事之”,重新建筑宫殿让郭隗住,并当作老师对待。天下贤人得到这个消息,都奔赴燕国。“乐毅自魏往,邹衍自齐往,剧辛自赵往,士争趋燕。燕王吊死问孤,与百姓同甘苦。”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,燕国殷富。于是,以乐毅为上将军,与秦、楚、三晋合谋以伐齐。结果打败齐国,占领了大部分领土,齐国只退守两三个县。这是燕昭王重贤,恤众,发展实力,富国强兵,打败比自己强的齐国,报了仇。这种对付齐国的方针是正确有效的,是成功的经验。当秦将樊于期逃到燕国,太子丹接纳了樊将军。这时太傅鞠武认为不应该为了一个人而得罪秦国,“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,足为寒心”。他建议吸取历史经验,开展外交活动,联合其他政治势力,共同对付秦国。但是,合纵已经瓦解,不可复振。太子丹认为太傅的办法太慢了,旷日弥久,不能救当前之急。于是,采取另一种方针,即利用少数人的暗杀恐怖活动来打击霸权主义。太子丹通过田光,找到荆轲,想通过暗杀行动来解决目前的危机。实际上,暗杀个别人物,只能产生一时的

轰动效益,无法扭转政治局势。当时秦王即使被刺身亡,秦国六世所形成的强势并不会减弱,也会因为燕国的行刺,而进攻燕国,实行复仇。难免导致燕国的速亡。事实证明,第二种方针是失败的,有深刻的教训。

韩非的理论是对秦国政治的总结,同时又成为秦国的指导思想。正如李斯所说:“秦四世有胜,兵强海内,威行诸侯,非以仁义为之也,以便从事而已。”(《荀子·议兵》)秦国逐渐强大起来,不是由于实行仁义,而是从实际出发,按最有利的方案去做就是了。怎么有利就怎么做,不考虑什么道义、公正等问题。秦始皇根据这一理论,让张仪巧舌如簧,言而无信,欺骗楚王。远交近攻,师出无名。能够胜利就行,所谓兵不厌诈。希特勒也有类似的说法,只要胜利了,没有人会向胜利者讨什么说法。

韩非与李斯的老师荀况在批评李斯的时候说:

非女所知也。女所谓便者,不便之便也。吾所谓仁义者,大便之便也。彼仁义者,所以修政者也;政修则民亲其上,乐其君,而轻为之死。故曰:凡在于军,将率末事也。秦四世有胜,諛諛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也,此所谓末世之兵,未有本统也。故汤之放桀也,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;武王之诛纣也,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,皆前行素修也,此所谓仁义之兵也。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,此世之所以乱也。”(《荀子·议兵》)

这段文字的大意是:以便从事,这种便是暂时的便,坚持仁义,才是长远的便。仁义是为了搞好政治,政治搞好了,人民就亲近上级,就喜欢国君,就愿意为他们牺牲。所以说,对于军队来说,打仗是次要的。秦国虽然四世都取得一些胜利,常常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。这就是末世的军队,没有统率军队的灵魂。所以说,汤流放桀,不是在鸣条那里才放逐的;周武王诛杀殷纣王,也不是在甲子那一天才战胜的,都是以前平常施行仁义的结果。

这就是所谓仁义之师。现在你不求本(仁义)而追求末(眼前胜利),天下就这样乱了。

荀子在这里提到两个问题:一是政治搞好了,人民就愿意为他们牺牲。秦国实行霸道,不断使用武力进攻弱小国家。燕国被迫无奈,就派荆轲去刺杀秦王。这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抵抗。也算是古代的恐怖活动。这种行为明显的是由霸权主义逼出来的。为什么荆轲不怕死,愿意牺牲自己?不是燕国政治有多么好,只是对秦国的霸权主义的反抗。二是不讲道义,只凭武力征服,会导致天下大乱。即使一时胜利了,也会很快亡国。秦国以自己的军事实力统一天下,结果还是导致天下大乱,而且秦国虽然强大,很快淹没于人民起义的浪潮之中。荀子的预见是相当正确的,因为他确实掌握了这种政治变化的基本规律。